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新修辞学与批评 话语分析的异与同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田海龙

将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相提并论，本身就预示着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认为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存在的条件，也不是说二者各自的领军学者彼此有着很通畅的学术沟通。相反，不论是在两个领域的学者沟通方面，还是在文献的相互引用方面，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各自的生成和发展都没有留下足够的痕迹证明它们之间存在过实质性的联系。然而，当我们跳出这两个学科的领地审视它们的主要观点和操作方法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虽然它们产生的地理位置相隔万里，它们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却都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这些“局外人”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准确来讲，新修辞学在 20 世纪 40 到 50 年代，甚至是更晚一点的 60 年代（温科学，2006：35）产生在美国，而批评话语分析则是在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产生于英国（田海龙，2006）。地理位置不同，但所处的人文环境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现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突出表现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反动，在将研究对象由孤立、静止和封闭的语言系统转向活生生的实际运用的语言的同时，语言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就包括认为意义不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而是由社会主体通过话语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权力关系的影响，贯穿着社会活动者的兴趣对事实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折射（田海龙，2014）。非常明显，语言已不再像一个客观存在的物体那样供研究者客观地审视，相反，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社会活动者如何运用语言这一资源来实现其构建身份、实施影响和参与活动的目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修辞学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认为修辞不再是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它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劝说；修辞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具有的东西，它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识。这种“修辞即认识”的观点将交际与修辞的过程看作是一个主体互联的过程，交际的主体通过修辞过程完成身份的话语建构（田海龙，2015）。同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话语分析提出话

语是一种社会实践 (Fairclough, 1992), 语言的运用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纠缠在一起, 二者不是相关, 也不是相互联系, 而是社会就存在语言运用之中 (Kress, 2011), 因而, 语言运用建构着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 并帮助语言使用者实现其社会活动的目的。

可见,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实现了认识的一致。然而, 正像批评话语分析的不同学派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由“媒介”建构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在这个“媒介”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样,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也在主要观点一致的同时各自有着迥异的操作方式。例如, 邓志勇和胡敏对《时代周刊》和《经济学人》2008年3月14日发生在我国拉萨的一系列打、砸、抢、烧等严重犯罪事件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时, 运用的方法是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 (Burke) 创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 (邓志勇, 2011: 165-179), 而对类似社会问题的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则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 辛斌对中美主流媒体对南海仲裁案报道的分析就分别采用议程设置的方法 (辛斌, 2017) 和框架分析的方法 (辛斌, 2018)。

以上研究案例虽然可以说明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有所不同, 但是, 若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恰好可以佐证上文提到的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契合。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才使得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有种殊途同归的默契, 使得二者汇合在条条道路都可通达的罗马。

例如, 新修辞学关于交际的主体通过修辞过程完成身份的话语建构的观点与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身份通过社会认知的方法被认识的观点, 就有异曲同工之效。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 讲话者通过对交际语境的主观判断, 才可选择适合的修辞策略和方式; 而只有讲话者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方式通过共同享有的理念被认可时, 讲话者的身份才可完成在听者方面的建构 (van Dijk, 2012)。在这里保留, 语境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它不再是事先客观存在的东西, 而是话语活动参与者依据其社会身份实时主观建构的东西。依据这个观点, 政治家的强势不是因为他使用了强势语言, 而是因为他使用的强势语言在听者那里被认为是具有强势的意义。换言之, 政治家的强势不是存在于他使用的强势语言之中, 而是通过听者的语境模式 (context model) 这类的社会认知主观构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采取了相同的认识真理的路径, 达到了学术思想的一致。

综上所述, 有理由认为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学术思想上有高度的契合, 其各自热衷的研究路径也促成了这些共同的学术思想。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London: Polity Press.
- [2] Kress, G. 2001.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A]. In W. Margarte, S. Taylor & S.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 Reader*[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3] van Dijk, T. 2012.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A]. In Hailong Tian & Peng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4] 邓志勇. 2011. 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5] 田海龙. 2006.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 40-47.
- [6] 田海龙. 2014. 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5): 14-20.
- [7] 田海龙. 2015. 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J]. 当代修辞学, (4): 32-40.
- [8] 温科学. 2006. 二十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 辛斌. 2017. 从议程设置看中美主要媒体关于南海争端的报道[J]. 当代修辞学, (5): 45-53.
- [10] 辛斌. 2018. 中美媒体关于南海争端报道的框架分析[J]. 外语学刊, (3): 20-26.

作为辩证家的伯克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邓志勇

伯克是当代美国修辞学泰斗，也是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修辞学家，享有当代亚里士多德之美誉，任何对当代西方修辞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似乎都免不了要提及伯克。笔者曾经对伯克的辩证思想进行过初步的探讨，但总觉得意犹未尽。现再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来看伯克的语言观及其蕴含的辩证思想。伯克（Burke, 1945: 402-406）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否定的行为。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语言仅是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人们用其他事物来谈论某个事物，而不是该事物本身。所有符号里边都蕴含的一种双重性，因为我们定义某一事物时必须用其他事物来定义它，而不是用它本身，即用不是该事物的事物来定义它。其二，语词的出现，就是用来否定的。说某人是黑人，必须要有白人、黄种人为基础或对照。世上若只有黑人，那就没有必要给为其命名为黑人。说某人是基督徒，言下之意是说他/她反对无神论，不信佛教或道教。试想在非洲的某个黑人国家里，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除黑人外的任何人种，他会认为自己是黑人么？显然不会，他根本没有黑